

论现阶段的中日国际分工

傅钧文

中日贸易格局原来是典型的垂直性分工,双方关系完全是互补性的,不存在竞争。近年来,中国对日出口中制成品比率上升,两国在纺织品等行业中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但进一步分析表明,两国即使在这些行业也存在明确的互补性关系。相关分析表明,在 APEC 成员中,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互补性最强,贸易竞争性最弱。

一、中日贸易与中日国际分工

在中日经济关系中,贸易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中日两国的分工取决于两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两国间的贸易则推动了两国的分工发生变化和深化。

1. 80 年代以来中日贸易结构的变化

在 80 年代以前,中日国际分工格局是典型的垂直分工,即中国从日本进口制成品,向日本出口农产品等初级产品。80 年代以后,中日贸易结构出现变化。中国从日本进口最大的变化是钢铁比重逐渐下降,同时一般机械和电气产品逐年上升,这反映出从日进口已从过去单一的重点产品转向多品种、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向日本出口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料性产品比重下降,同时纺织品跃居首位,机械和电气类产品的比重也逐渐上升,从中可看出近年中国对日出口中制成品比重上升,初级产品比重下降。

中国从日本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国经济增长引起日本成套设备、化工产品、钢铁和运输机械进口的增加,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则大大促进了日本电气产品等消费品的进口,日本对华以产品组装为重点的直接投资则导致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进口。

中国对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第一,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及委托加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日本制成品的出口。第二,日元大幅度升值提高了中国制成品在日本的价格竞争能力。第三,日本政府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日本企业进口中国制成品的积极性提高。第四,中国政府采取的振兴出口政策和中国一些企业竞相削价出口。第五,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导致中国对日原油出口额下降。第六,一大批中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它们依托廉价丰富的劳动力,其产品在日本具有很强的价格竞争力。

尽管中日两国的贸易商品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两国分工格局开始朝着水平分工方向发展,但两国贸易结构仍存在巨大差异,这决定了两国国际分工的性质。

2. 清晰明确的中日专业化分工格局

中日在世界贸易中存在着明确的分工。中国的出口专业化产品即日本的进口专业化产品,同时中国的进口专业化产品也即日本的出口专业化产品。无论是根据常识还是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报告》中的定义,中日各自出口专业化产品无疑分属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因此,现阶段的中日国际分工的主要格局可以说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分工。

如果将视点集中在中日双边贸易,上述全球中的中日国际分工的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中国进行对日贸易时,中国整体出口专业化强度减弱,在全球处于出口专业化的产品在对日贸易中其专业化指数有的转强有的转弱,但在全世界本来就处于进口专业化的产品在对日贸易中其专业化指数则进一步转弱。对日贸易中的中国出口专业化产品基本上是两大类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加工程度较浅的产品。这也说明中日国际分工的垂直性依然很强。

3. 专业化分工的动态发展

上文论述了中日国际分工的横向即贸易地区间的比较,现在进行一下纵向比较,即特定贸易地区的时间序列比较。从中可看出以下特点。第一,总体分工格局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出口专业化产品从9类减少到8类,进口专业化产品从15类增加到16类,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专业化产品依然大大少于进口专业化产品。第二,9类出口专业化产品中有7类专业化分工指数缩小,其余两类的指数增大。15类进口专业化产品中有6类的专业化指数缩小,其余9类的指数增大。这说明中国出口专业化产品的出口专业化程度和进口专业化产品的进口专业化程度均有所削弱,整体出现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的迹象。第三,中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加工程度较浅的初级产品的专业化指数缩小,它们的出口专业化程度有所减弱,而加工程度较深的制成品的专业化指数增大,它们的出口专业化程度有所增强。当然,后两个特点并不绝对意味着中日分工程度的减弱,其中专业化指数趋向于0还意味着两国水平分工的程度有所提高。

4. 中日贸易的竞争与互补

中日贸易关系竞争或互补与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看两国分工格局的基本特征。虽然中日两国贸易开始出现水平分工的发展势头,但迄今为止两国分工仍主要是垂直性分工。这里的垂直性分工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初级产品对工业制成品的分工,实际上在中国对日出口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两国垂直性分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和日本各自比较优势产品分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两国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差异反映了两国要素禀赋状况,构成两国国际分工的基础。第二,从产品加工程度的角度来看,中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初级产品依然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而日本的优势则在于产品的深加工和科技的深开发。第三,当今国际分工的主流是产业内部分工,它主要表现在产品特色(差别化)分工。近年,中日的产业内部分工也有长足的发展,但它主要体现在因商品的附加价值的大小、质量的好坏、功能的多少等差异而产生的分工,这是一种垂直的产品差别化分工,即中国基本上是出口低档商品,进口高档商品。第四,产品生产工艺之间的分工是产业内部分工的又一种类型,近年外资的进入使中

国也参与这一种分工。但目前仅参与其中的产品组装和被动加工的工艺,而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基本上还是由外资企业的母公司进行。因此,这种分工是一种垂直性的生产工艺的分工。从根本上讲,中日这种国际分工是由两国所处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发达国家的日本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之间产生这种分工格局是很自然的。

在垂直性分工格局下,两国的贸易关系只能是互补的,无竞争可言。在目前中日分工垂直性依然很强的情况下,中日贸易关系基本上还是互补性的。

其次,看中日对 APEC 成员出口结构的相似性。从中国和日本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来看,中国在 SITC 一位数的第 3 类的个别产品、第 5 类、第 6 类和第 7 类与日本的出口相似,因而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其中与日本出口结构较相似的(即该产品占中国总出口比重较大的)是第 33 类“石油和石油产品”、第 52 类“无机化学品”、第 54 类“医药品”、第 65 类“纺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第 66 类“非金属矿石制品”、第 68 类“有色金属”、第 69 类“其余金属制品”、第 89 类“杂项制品”,其余产品,虽与日本的出口结构相似但日本的该类产品的出口比重要大得多(如第 7 类产品)。上述与日本有形成一定竞争关系的中国出口产品很明显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加工程度较浅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第 54 类“医药品”应视为“中药原料”)。^①

由于日本是世界出口大国,出口基数大,因此上述产品的日本出口绝对值实际上远远大于中国的出口绝对值。另外,由于发达国家注重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造成同一出口产品的档次多样化。例如,钢铁有普通钢与高张力钢、表面处理钢之分,复印机有黑白与彩色之分和模拟机与数字机之分,电脑有台式与笔记本式之分,家电有简单功能与复合功能之分,即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全棉面料也有一般面料和抗皱免烫面料之分。目前中国大部分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档次还较低,因此,从产品差别化分工的角度来看,中国与日本形成出口产品档次的互补,中国出口产品并不构成对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竞争。

再次,看中日贸易结构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大于 0 表明两国间贸易结构具有相似性,从而形成竞争关系,越接近 1 表明两国间竞争性越强,相关系数小于 0 表明两国间贸易结构具有差异性,从而形成互补关系,越接近 -1 表明两国间互补性越强。相关分析表明,在所有 APEC 成员中,中国与日本的相关系数为 -0.351,^②中国与日本的贸易结构竞争性最弱,而互补性最强。

二、中日产业内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当今国际贸易中一个令人注意的现象是产业内贸易,即两国在同一产业发生贸易行为。一般认为,产业内贸易发生在经济水平相同、消费习惯相近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之间。但近年国际贸易的现象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产业内贸易。

1. 中日产业内贸易

产业内贸易出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方面说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成熟和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普遍运用,同时也反映发展中国家出口结构的改善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从整体上来说,产业内贸易(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是生产国际化的结果,是国际间资本、劳动、技术和货物流动加速的体现,是世界市场高度开放、高度一体化的产物。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是最低的,^③这也成为外国批评日本国内市

场封闭的一个论据。但是,日本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近10年来是一直上升的,1993年,日本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从1983年的25.8上升到33.1。在同一年,中日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也达到31.6,处于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内贸易的相同水平(日本与“亚洲四小”的指数是32.4,与东盟的指数是30.8)。^④1993年以来,由于许多日资企业在中国开业生产,产品返销日本,因此估计目前中日的总体产业内贸易指数会更高。

但是,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的上升并不绝对说明两国已完全走向水平分工。实际上,产业内贸易可分为基于生产工艺间分工的产业内贸易和基于产品差别化的产业内贸易。前者的生产工艺间分工指企业将产品生产分成几个阶段、并由国内公司和国外子公司分别从事生产。这时水平性工艺间分工指企业的国内和国外子公司都从事技术水平或要素密集度相同的工艺加工,垂直性工艺间分工指根据国内和国外不同地区不同情况,由子公司分别从事技术水平或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工艺加工,如日本企业把需要大量简单劳动力的工艺放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将需要知识或复杂劳动的工艺放在其他发达国家。近年日本汽车产业和机电产业常在本国国内设计再到中国等国家生产一般零件并组装,然后最终产品再返销日本,这种做法即是基于工艺间分工的产业内贸易,这样造成同一产业日本向中国出口技术和资本含量较高的产品,中国向日本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现象。

后者的产品差别化也可分成垂直差别化和水平差别化。中日产业内贸易大多是基于垂直差别化的贸易,即在同一产业中,日本向中国出口高档产品,从中国进口低档产品。

中日各自贸易进出口统计也反映了两国在产业内贸易上的特点。例如,精密机械产品是两国产业贸易指数较高的产品,这些产品在1996年占日本对华出口额的4.26%,同时也占日本从中国进口的1.68%。但进一步分析就可知道,在精密机械中,日本向中国出口照相机、复印机、医疗仪器、计量仪器、物理分析仪器、化学分析仪器、电气测定仪器、温控器、钟表等,而中国仅向日本出口照相机、复印机和钟表。又如钢铁占1996年对华出口额的7.30%,同时占日本从中国进口的1.26%,但在其中中日仅在宽6米以上的热轧板上互有进出,其余基本上是日本向中国出口超厚钢板、超薄钢板、特种钢和不锈钢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中国向日本出口生铁、硅铁、硅锰铁和铬铁等原料性产品。^⑤

总之,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来看,尽管近年中日产业内贸易大大增加,但在与日本的国际分工中还是处于较低的层次。

2. 日本对华投资对中日分工的影响

在中日产业内贸易中,无疑日本对华投资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资企业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正是有了一大批在华日资企业,中日国际分工才出现了深化。日资企业在中日分工中所作出的贡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促使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了中国产业升级换代。据统计,日本对华投资的70%以上投向制造业,依照投资额的大小排列行业顺序依次为:电器、纺织、运输机械、钢铁、有色金属、普通机械、食品、化工等。^⑥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电子、通信、化工和机械的投资有了急剧增加。日资对这些行业的投资为这些行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打下了基础,为这些行业的对外出口提供了动力。第二,直接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一般而言,对于东道国来说直接投资对贸易会先后出现进口诱发效应、进口替代效应、出口诱发效应和返销效应。外资企业在设立初期,往往需要从投资国进口大量资本货物。如果外资企业的零部件未实现当地采购,还需从投资国进口中间产品。所以在这一时期外资企业会增

加东道国的进口。随着外资企业产品国产化率的提高,进口替代逐步实现,东道国将减少其进口。外资企业产品具备出口竞争力后,可能向第三国出口或向投资国返销。从近年日本对华投资剧增、中国对日贸易大进大出和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迅速提高等情况来看,日资企业对于中国进出口的替代和诱发的效应不仅存在,而且是相当明显的。

虽然目前还无法获取中日双边贸易中日资企业所占份额的数据,但通过以下分析,我们还是能得出结论:日资企业在双边贸易中,尤其是在某些产品的进出口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相比,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结合得更紧,对推动贸易发展的作用更大。因此,日本的直接投资被称为是一种“顺贸易的直接投资”,^⑦它与贸易形成了一种“扩大的循环机制”。^⑧

其次,日本对华投资与中日双边贸易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中日双边贸易是与日本对华投资息息相关的,对华投资有力地促进了对华贸易。

再次,中日双边贸易中外资企业贸易所占份额较大。随着外资企业数量在华的增加,在中国对日进出口中,外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原料的进口迅速增加。1996年,在华外资企业对日出口149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35.4%,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48%,进口195亿美元,增长14.7%,占中国自日本进口的67%。而在同期,中国国有企业的对日进出口能力却明显下降,其中对日出口154亿美元,下降9.4%,占中国对日出口的50%,进口90亿美元,下降18.7%,只占中国自日本进口的31%。^⑨

最后,在华日资企业的产品返销比例高。日本企业向中国投资的目的主要在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很大部分是外销或返销产品。^⑩另外,日本1995年调查,日本国内72.3%的制造业母公司向在华日资子公司采购半成品和最终产品,这一比例仅次于日本向东盟日资子公司采购的比例,大大高于日本向其他地区的采购比例。^⑪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在华日资企业产品返销比例高的情况。外资企业产品返销比例高和母公司向海外子公司采购商品比例高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即企业内贸易比重的上升。产业内贸易与企业内贸易相比,前者的着眼点放在交易产品的种类,而后的着眼点在于从事交易的主体。企业内贸易是跨国公司为获取在本企业这一封闭的内部市场垄断性利润而出现的跨国公司的交易方式。近来,日本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企业内贸易比率(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或进口额/母公司的总出口或总进口额)逐年上升,目前已达到或略超过美国跨国公司的水平。^⑫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还影响了双边贸易方式。在华外资企业主要采取来料和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而国内其他企业以一般贸易为主要方式。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外贸中地位的上升,它们对中国的外贸方式也产生了影响。1996年加工贸易的进出口额首次超过中国外贸总额的一半,达51%,增长11%,而曾经作为外贸主要方式的一般贸易进出口下降11%,占外贸总额的35%。1996年中日双边贸易与近几年一样,也是加工贸易增长,一般贸易下降。对日出口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分别增长16.2%和下降0.8%,它们分别占对日出口总额的55.7%和43.4%;从日本进口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分别增长1.3%和下降16.5%,它们分别占从日本进口总额的54.2%和19.2%^⑬。可见在中日贸易中,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加工贸易的份额都超过了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在中日双边贸易中的份额和加工贸易自身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在对日出口中所能获得的出口附加值很低,而且进口和出口都严重依赖于日方。

三、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

中日贸易与投资的迅速发展,使两国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两国都从这日益紧密的经济交往中享受巨大的经济利益。

两国贸易的展开和扩大不仅使各自外贸对对方依赖关系的加深,而且也导致本国整个国民经济对对方市场依赖程度的提高。

在中日经济关系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正在成为连结两国经济的又一重要纽带。虽然作为对华投资结果的一部分已反映在前面所述的双边商品贸易中,但直接投资是集资本、劳动、实物、生产技术、经营技术、技术诀窍和信息于一身的经营性资源的国际间转移,因而它的出现和展开会引起双边经济的多层次、多渠道的联系,它对双边的影响要比单纯商品贸易要大得多。

通过投资与贸易,中日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同时也相互更受对方的影响。

首先,通过贸易,中日双方都从中享受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方面,180年前李嘉图著名的比较利益学说对分析中日两国贸易现状依然有效。但由于中日两国分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两国商品贸易结构的不同,也决定了两国贸易条件的差异。事实上,近年中国的贸易条件一直在恶化,中国实现出口大幅度增长实际上是建立在国内厂商竞相削价和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基础之上的。以1980年为100,中国的贸易条件在1990年下降为96.58。根据日本的贸易价格指数计算的结果也表明,在1993至1996年上半年期间,日本对全世界的贸易条件恶化了,对亚洲的贸易条件是基本不变,但对中国的贸易条件则略有改善。

其次,看直接投资。日本的直接投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其作用不仅重要而且其好处也是多方面的,如弥补国内资金缺口,增加接触先进技术和管理技能的机会,通过合作伙伴扩大出口市场渠道,提高员工的才能,增加就业机会,增强产业竞争力等等。从发展中国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好处可归纳为“后发性利益”。中国通过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这是无形的但却是最大的“后发性利益”。

日本通过对华投资同样享受到巨大的利益。第一,日本可得到产业结构升级后的整体利益。一国产业的兴衰和交替是不可避免的规律。日本通过产业转移,淘汰夕阳产业可将资源集中用于发展那些附加值更高的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可增加一国整体对外竞争力。8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许多日本企业将中国列为其产业转移的首选地。10多年来,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潜在市场被日本重新认识,日本企业因而纷纷涌入中国。第二,绝大部分日资企业在华获利。日资企业由于更熟悉中国的国情,加之经营有效,因而90%以上均能获利。在世界各地的日资企业中,在华日资企业近4年(1990~1994年)的年均利润增长率是最高的,为22.9%大大高于其全世界3.9%的平均值。^①第三,对华投资给日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小。经济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会造成投资国国内就业减少等“空洞化”问题,海外子公司产品的返销会造成投资国国内生产下降等原因。但最近日本的调查表明,85.1%有海外子公司的日本公司不打算减少其在国内的生产,71%的公司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影响国内的就业,并且不打算裁员。

四、中日国际分工展望

中日间的经济合作正在从过去的垂直分工开始走向某种程度的水平分工。今后10年,这一国际分工变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中日国际分工可能会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首先,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重视内需的经济政策将为两国的贸易和投资提供巨大的舞台。

在“九五”期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将达8%,下世纪前10年增长率也将保持在7%左右。在“九五”计划中,中国外贸总额到2000年预计为4000亿美元。1996年中国外贸总额为2899亿美元,要在4年后的2000年达到4000亿美元的进出口规模。外贸增长率应为8.4%。从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和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一增长率并不是很高的,很有可能被突破。

近10年来,中日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6年中日贸易额达60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20.7%。如果到2000年保持20%的份额,那么届时两国的贸易额将达800亿美元,今后4年的双边贸易年均增长率应为7.05%。对于中日贸易来说,这应该说是一个低速增长的数据。进入1997年,中国有关官员作出到2000年中日贸易额将达1000亿美元的预测。^⑮根据这一估计,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将达25%,今后4年双边贸易年均增长13.6%。

日本重视内需的经济政策也将有利于中日贸易的发展。80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致力于扩大内需,收到一定的成效。1996年,在日元开始回落、贸易顺差开始下降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仍表示今后将继续执行扩大进口的政策。虽然日本国内舆论认为扩大进口容易导致国内产业空洞化,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由于日本扩大低价格产品进口而使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了提高。从这一点来说,日本的进口政策不仅没有使日本产业产生空洞化,反而防止了空洞化时代的到来。

其次,两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使两国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结构调整的攻坚战,在外贸方面主要是实现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第二个转变,即由主要出口粗加工、浅加工、低附加值的产品向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因此,今后几年,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制成品率会进一步上升,出口产品质量会进一步提高,中日国际分工格局会继续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日本目前也正在实施产业结构改革。第二届桥本内阁成立后,桥本首相即推出包括经济结构改革在内的“六大改革”,通过这一改革,日本的产业结构将向高附加值领域倾斜,整体竞争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在改革中,原有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将向海外转移,为此日本国内今后将重点发展15个新兴产业,即医疗福利产业、信息通信产业、新型制造业、海洋产业、生活文化产业、交通运输产业、环境保护产业、商务后勤产业、民用航空航天产业、新型能源产业、人才培养产业、住宅产业、生物技术产业、城市环境整治产业和涉外产业(主要指促进进口和促进对日投资、对外开放国内旅游市场等)。在产业结构的改革过程中,必将有一批产业向外转移,而在此期间,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只要中日劳动力成本存在巨大差异,日本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实施产业转移的步伐就不会放慢。如前所述,日本对华投资无疑将进一步增加中日产业内贸易,深化现有的分工。

①② 的具体数据参见张幼文主编《中国与 APEC 分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即将出版。

③ [日]贝塚启明等监修:《日本经济事典》,第404页,日本经济新闻社,1996年6月第1版。

④ [日]《日本贸易会月报》，1996年第1期。

⑤ [日]《国际贸易》1997年3月11日。

⑥ [日]《财政金融统计月报》，1995年第12期。

⑦ [日]小島清:《外國貿易》,春秋社1981年第5版。

⑧ [日]渡边利夫:《开发经济学》,日本评论社,1986年5月第1版。

⑨⑬ 《国际经贸消息》，1997年3月11日。

⑩⑪⑭ [日]《JETRO 白书·贸易篇》，1996 年版，第 54 页、第 82 页和第 49 页。

⑫ [日]《JETRO 白书·投资篇》，1996 年版，第 47—53 页。

⑮ [日]《国际贸易》，1997年2月4日。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上接第2页)

贸易功能 可考虑通过上海在香港的窗口企业,直接在香港建立综合性的贸易企业。利用香港的信息、人才和自由港的优势,先建立全球性的贸易信息和销售网络。然后,利用香港的资金优势,在上海现有的出口生产企业中,挑选一部分出口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与在香港的综合性贸易企业联手,到海外投资,达到加速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上海出口的目的。

生产功能 可考虑在上海选择一家或几家进口替代产品技术开发能力较成熟、生产较稳定的大型机电企业集团,按产业内分工的原则,首先在海外通过收购、兼并、参股等形式,进入当地关键设备、零部件和技术开发的领域。然后向国内出口,提高进口替代产品的技术档次,并推动进口替代产品向出口替代升级,提升上海出口产品结构。

金融功能 海外投资的贸易和生产功能的形成都必须有金融的支持。可考虑在香港设立相应的财务公司、控股公司、投资银行或商业银行,为上海在海外的企业提供筹资渠道和资金融通。

总之,通过探索海外投资的新路,拓展发展出口贸易的新空间,有利于克服上海在人民币持续坚挺的情况下出口成本不断提升、出口市场单一化以及出口增长过度依赖外商投资企业等结构性不稳定因素,使面向海外的贸易空间的拓展与国内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和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化相结合,形成新的出口贸易格局,保持长期稳定的出口增长。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